

# 略论碑刻所见清朝北岳祭祀的政治文化意涵\*

孙瑜

**内容提要** 清朝汉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北岳祭祀的儒家政治文化属性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视角。通过解读《三晋石刻大全》等与恒山北岳祭祀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这一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政治、民族及文化等层面，均体现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展，北岳祭祀的历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的汉化意识和汉化实践。

**关键词** 清朝 汉化 北岳祭祀 碑刻

“新清史”<sup>①</sup>之争引发的清朝历史定位的问题，不仅是与清史研究，更是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史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北岳祭祀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政治制度，具有强化国家认同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拟以清帝遣官致祭北岳所留下的碑刻为主要史料，探究清朝北岳祭祀的历史面貌，进而在国家认同视角下，挖掘清朝北岳祭祀的政治文化意涵，揭示清朝在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汉化的意识与实践。

## 一 清朝北岳祭祀的历史面貌

有清一代，皇帝遣官致祭北岳留下的37通致祭碑，真实地记录了清朝北岳祭祀的历史面貌。这些资料主要收录在《三晋石刻大全》<sup>②</sup>，本文据此对其中所反映的清朝汉化过程的意义展开讨论。

---

\* 本文系2015年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项目——《高校国学教育教材内容研究》(项目编号: 2015GX10)阶段性成果; 2017年山西省社科联重点项目《“丝路精神”与“长城意识”二元变奏下的大同军与边疆社会》(项目编号: SSKLZDKT2017119)阶段性成果; 2017年山西省大同市科技局软件学研究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大同长城石刻的整理与旅游开发研究》(项目编号: 2017152)阶段性成果。

① “新清史”之争起于何炳棣和罗友枝，参见：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6, No.2(Feb, 1967), pp.189-195; 罗友枝:《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何炳棣:《捍卫汉化：驳罗友枝之〈再观清代〉》，刘风云、刘文鹏:《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页1—18、19—5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 陈学锋:《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续编》，三晋出版社，2013、2015年。

中国古代社会有祭祀山岳的传统，清代，山岳祭祀为群祀，一般是遣官致祭<sup>1</sup>。据碑载，顺治朝，皇帝曾两次遣官致祭北岳，分别在顺治八年(1651)和十八年(1661)，碑文均书“诞膺天命”。顺治皇帝于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亲政，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亡故；初九日，康熙帝即位。顺治十七年七月，朝廷决定将北岳之祀由河北曲阳移至山西浑源<sup>2</sup>。由此，顺治朝的两次北岳之祀应先后在河北曲阳和山西浑源举行，分别是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登基亲政之祀典。自清康熙帝起，北岳祭祀改在山西浑源举行。

据碑文统计，自顺治朝迄光绪朝，清朝共九位皇帝曾遣官致祭北岳37次。北岳御祭一般在登基亲政、升祔致祭<sup>3</sup>、配享圜丘、寇除凯旋、寿诞庆典、上尊号及徽号等六种情况下举行。

北岳恒山祭祀的接官地在山脚下的停旨岭村。据民间传说，此村原名秦止岭，因秦始皇东巡琅琊归途中路过此地而得名。清代，在此修建了接官亭，是道士们下山迎接皇帝派来的致祭官、陪祀官的地方，故改名停旨岭。清光绪二年(1876)因修缮恒宗大殿而勒石的《捐资芳名碑记》载：“同治十年至十二年所入布施停旨岭地租钱项均已用讫……停旨岭自同治年十二年口口开垦地租五石作为恒庙岁修之费。”<sup>4</sup>由此，晚至清同治及光绪年间，停旨岭村的土地已属于国家征用地，其地租钱是专用于恒岳庙修缮的款项。

自顺治朝至嘉庆朝，北岳御祭之主祭官主要是四品以上文职京官，如内阁侍读学士、工部右侍郎等；此外，还有武职京官銮仪卫同知，及武职外官雁平道使等。自清道光朝始，主祭官均为正三品以上武职外官，主要有山西太原镇、大同镇总兵官<sup>5</sup>。

## 二 国家认同视角下清朝北岳祭祀的历史构建

北岳祭祀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祀典，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下一统”“君权神授”的儒家政治理念，是历代帝王彰显皇权、强化国家认同的一条途径。国家认同指民众对于所属国度自觉意义上的心理归属。国家是在政治、民族、文化三个维度上形成的共同体<sup>6</sup>，以下即从政治、民族、文化三个层面，探究北岳祭祀是如何体现并强化国家认同的。

---

〈1〉 王秀玲：《清代国家祭祀及其政治寓意》，《前沿》2016年第6期，页103—107。

〈2〉 《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页119、121，中华书局，1976年。

〈3〉 “升祔后的致祭礼。为升祔祭告礼的组成部分，致祭礼的致祭对象为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阙里、先师。”前揭《清史稿》卷八二《礼一(吉礼一)》，页2500。相关研究参见张小李：《清代皇帝宗庙神牌升祔制度述略》，《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5辑，页93—104。

〈4〉 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225—226。

〈5〉 前揭《清史稿》卷一一四《职官志一》至卷一一九《职官志六》，页3263—3477。

〈6〉 吴玉军：《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页4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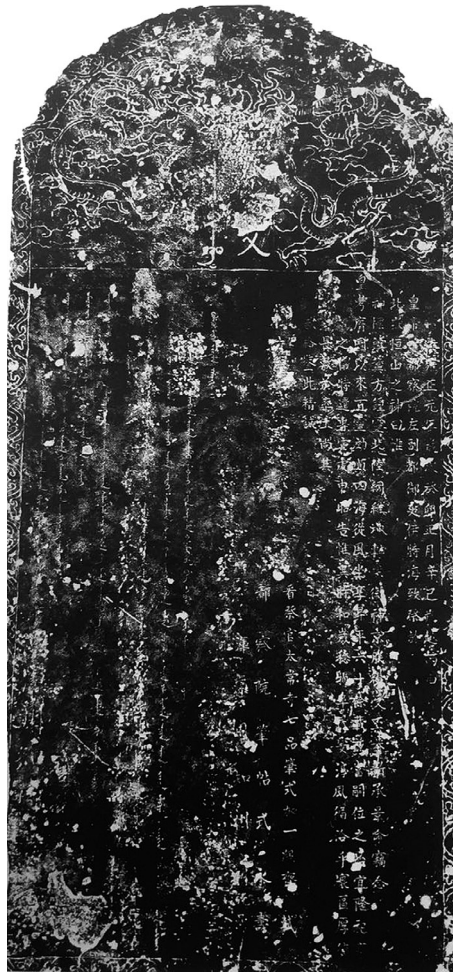
## （一）改祀浑源与政治认同构建

北岳祭祀的意义在于政治及军事两端。首先是政治意义。在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认知观及中原汉人与四周夷狄的二元政治模式下，“天下中国观”<sup>1</sup>作为儒家政治文明的理念，得到了普遍认同。其核心要义是居中为正，居中为汉。北岳祭祀的政治意义正在于天子居中，昭告天下，彰显皇权。其次是军事意义。北岳神祇作为护佑北方的神灵，因中原王朝的北部边患而具有一定的军事庇护功能。

北岳改祀之议在明弘治、嘉靖年间不断被强调<sup>2</sup>。浑源州作为明代九边重镇——大同镇的属地，其军事重要性在明代的提升，推动了浑源北岳祭祀在地方层面的发展<sup>3</sup>。然而，自隆庆和议以降，雁北地区军事地位的下降是北岳改祀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

自隆庆五年(1571)明蒙达成通贡及互市协议后，战事不再是雁北地域汉蒙交互的主流，北岳神祇的军事功能下降，北岳改祀的意义也因之而下降，清初自明中叶以来对于北岳改祀的反对之声亦未停止<sup>4</sup>。然而，清廷还是决定改祀，并对北岳祭祀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应是对于北岳祭祀政治意义的看重，清廷意在通过浑源北岳祭祀彰显其王权统治。清朝北岳祭祀的碑文再现了“大一统”“君命神授”“民为邦本”等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皇帝御驾亲征，朔漠平定，即遣官致祭<sup>5</sup>，以申统御天下、四夷咸宾的威严。自春秋以降，重民思想渐成为君王治政固本之共识，清朝北岳祭祀碑文中，或以神灵护佑土地肥沃、稼穡常丰；或以天下太平、民安其业，体现其民本思想，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五旬大庆，祭文曰：“今者，适届五旬，海宇升平，民生乐业……佑我国家共登仁寿。”<sup>6</sup>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登基致祭之碑文曰：“惟冀四时翊应……九谷蕃滋。”<sup>7</sup>

〔图一〕清雍正元年(1723)汉文、蒙文双语碑  
采自《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



1.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页187—206。

2. 牛敬飞：《从曲阳到浑源：北岳移祀过程补考》，《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2009年第4辑，页62—64。

3. 牛敬飞：《明代北岳信仰转移及其军事背景》，《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页250—257。

4. 牛敬飞：《经典的曲从：北岳移祀的知识史考察》，《历史地理》第25辑，页219。

5. 《皇帝遣户部右侍郎贝和诺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碑》，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116。

6. 《皇帝遣内阁侍读学士加六级卢起隆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碑》，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117。

7. 《皇帝遣山西太原镇总兵乌勒欣泰致祭于北岳之神碑》，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191。

〔图二〕清康熙二十年永革陋规碑  
采自《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



## （二）“双语碑”与民族认同构建

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皇帝嗣位致祭北岳之碑，以汉、蒙两种文字书丹、勒石〔图一〕。雁北地域自明代以来即是汉蒙交流的重要通道，隆庆和议之后，汉蒙贸易成为民族交流的主要方式，长城沿线堡镇多设马市，人口流动频繁，该地域遂成为汉、蒙、满等民族交汇与聚集之地。“清代康、雍、乾时期，在右卫城东门外驻守着满、蒙、汉八旗官兵及马匹近万余”<sup>1</sup>。北岳祭祀碑中“双语碑”的出现，在促进民族融合、民族认同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 （三）雁北民间北岳信仰体系与文化认同构建

北岳信仰源于中国古代以山岳为对象的自然崇拜，山不仅是人们生活的物质来源，而且是人们的精神寄托。随着国家的产生，山岳复被赋予了政治使命，具有镇压邪恶、安邦定国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就北岳信仰而言，存在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自康熙帝改祀浑源后，历代皇帝在遣官致祭北岳的同时，并没有放松民间信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在雁北地方社会北岳信仰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干预始终存在。

首先，革除陋规。自恒山改祀以后，浑源之恒岳大会盛况空前，四方信士进香、施钱、舍物甚众。按照恒山的旧规，凡所献财物由乡约监收，交州府统筹支用。自康熙朝起，地方官员努力欲改此陋规，主张民间敬神之物应为神享用，不仅下令改革，而且带头捐献奉银用以修建庙宇。

清康熙二十年(1681)，州官叶九思捐奉银以除积弊，并立碑以志〔图二〕。

其次，官资修庙。由国家出资兴建北岳庙等行为，是国家提倡并促进雁北民间北岳信仰大力发展策略的体现。恒山改祀初期，因祭祀之需，庙宇的修建由官资承担。康熙二十三年冬，“皇上恩诏，内一款敕有司缮修岳庙”<sup>2</sup>。时浑源知州张应薇与奉皇命监察恒岳庙颓废状况的蔚州知州耿夔忠一起，共同预算费用并造册申报。次年二月，即发资采买材料，六月开工，七月竣工，恒岳庙焕然一新。由碑记可见，此次修庙由官资承担；地方官员奉旨组织修缮。清乾隆年间，重修北岳行宫，朝廷曾拨专款，碑记：“迩年，皇上特发帑金十二万两增饰旧观。”<sup>3</sup>

〈1〉 雷云贵：《三晋石刻总目·朔州市卷》页78，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2〉 《重修恒山岳庙碑记》，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109。

〈3〉 《重修北岳行宫记》，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345。

最后，官助民办。自嘉庆以后，恒山北岳庙的修建采用官助民办、以民资为主的庙宇修建模式。嘉庆八年(1803)，恒岳庙破败，“时郡宪李太守亲诣相度，首捐金以倡其事”<sup>41</sup>。州人踊跃参与，富者输财；能者效力。道光七年，浑源知州王志敬首捐廉奉伍万文，带领郡人重修北岳恒庙<sup>42</sup>。同治九年(1870)，浑源知州孔广培，将地方年迈德高之人聚合在一起，并首先捐廉银以倡民，集众力，历时三年，将庙宇修葺如新<sup>43</sup>。

在这种官助民办修庙模式中，贞元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光绪年间，浑源民间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贞元会，由地方官员牵头组织，乡绅管理，百姓参与。一般由地方官员或乡绅捐出一定的银两，作为投资的本金，以其利钱作为修缮恒岳庙的公费。清光绪八年(1882)八月所立《贞元会纪事碑》载：“尔峰贺大老爷，于光绪七年闰七月捐廉并筹捐共凑足小钱肆千肆百吊整，作为资本发商，按月壹分生息，每年共得利小钱肆百口拾捌吊，以备每年补修恒山庙宇。……介山郑大老爷，于光绪八年七月，而因宾兴会费用拮据，同绅董商酌，拨在宾兴会小钱壹千吊整，申详立案。至此本会净存小钱叁千肆百吊，每年共得利小钱肆百零捌吊，每年六月底、年底两次收利，每年出入花用一切费项，经理绅董等明分帐以昭慎重。”<sup>44</sup>清光绪十二年(1886)，浑源知州谢澍恩到任后，即建立贞元会，并自捐钱叁佰两，作为恒岳公费及禁止开荒伐木的费用<sup>45</sup>。贞元会名的来历，或与北岳祭祀的正殿——恒宗殿有关，恒宗殿是恒山的主庙，又名贞元殿。

官方引导、民间自主的地方专门管理机构的出现，反映出国家意志在北岳信仰体系发展中的主观作用的逐渐减少，以及北岳民间信仰体系日渐成熟的态势。以道光及光绪年间雁北地区北岳庙的修建为例，北岳信仰体系的建设及发展过程，反映出地方社会民众齐心协力自治自养的和谐生活状态。首先，全民参与。参与修庙的人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有村民、铺户、乡绅、庠生、监生、住持；有当铺、肉铺、饼铺；有泥匠、木匠、石匠、油匠、画匠。其次，自愿捐资。修庙费用几乎全部来自民间社会，乡绅、铺户是主要捐资者。据清道光初期的《重修北岳恒山绅士行户布施碑记》载，此次修缮捐资者中，绅士45人、当行30家、杂行24家、缸房行65家、肉铺饼铺等其他铺户117家，共捐修庙资用6057吊98文。乡绅、铺户以外，村民也是主要捐资者，来自麻地坪村等88个村的村民，捐资计3005吊650文<sup>46</sup>。最后，经过长期的发展，庙宇周边形成了固定的、有一定文化主题的活动日——北岳庙会。每年四月初八日，四

41 《祀岳碑》，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149。

42 《重修北岳恒庙记》，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159。

43 《北岳立庙以祀》，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220。

44 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233。

45 《贞元胜会碑记》，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234。

46 《重修北岳恒山绅士行户布施碑记》，前揭《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页160—161。

方信众汇集北岳庙，举行祭拜活动<sup>1)</sup>。

雁北民间北岳信仰体系的发展及成熟过程正是清朝地方社会文化认同构建的过程。在朝廷的着意引导及扶持之下，北岳庙成为了地方民众祭拜山神、祈祷神灵福佑的文化场所。在对北岳神的崇信中，形成了风调雨顺、太平安康的共同心灵寄托。共同的信仰促进了民众对社会义务自觉担当的共同心理的形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此外，因北岳信仰所产生的民间自治行为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乡约制度”<sup>2)</sup>，民间北岳信仰体系间接地承担了地方社会的管理和教化作用，使皇权借神力在地方社会得到了延伸，所谓“王法为有形之教化，神威为无形之教化，庙貌森严，无形者亦俨然有形矣”<sup>3)</sup>。

### 三 结论

以北岳祭祀为视角的清朝国家认同构建的三个层次的实践——政治认同构建、民族认同构建和文化认同构建，无一不体现了清朝的汉化意识。改祀浑源体现了清朝对于儒家正统理念的认同与推崇，北岳祭祀碑文进一步体现了清廷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赢得民心、安邦定国的决心。“双语碑”则反映了清朝作为入主中原的北族王朝对于隋唐以来“四海一家”“混一戎夏”的民族心理及民族意识的继承和发扬。朝廷官府对于雁北民间北岳信仰体系发展的扶持和引导，使民众在北岳庙这一共同场所，因为对神灵的共同信仰而产生了认同感和凝聚感。总之，在国家认同层面上，清朝北岳祭祀的历史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的汉化意识和汉化实践。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

① 《敕建北岳庙记》，前揭《三晋石刻总目·朔州市卷》页137。

② “乡约制度是宋儒提出的教化、控制基层社会的措施，明清迅速普及。清朝通过乡约宣讲省谕，教化、管理乡村。”载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页14。

③ 《吴家庄修庙碑记》，前揭《三晋石刻总目·朔州市卷》页97。